

# 从《国语》看我国早期散文的发展轨迹

孙雪霞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国语》非一人一时之作,客观上为研究我国早期散文提供了可靠的蓝本。其中的《周语》凝练古朴,《齐语》层次渐明,《越语》纵横捭阖,三个时期的作品勾勒出早期散文发展的轨迹,展现了中国史官的实录精神。

**关键词:**《国语》;散文;实录;发展史

长久以来,《国语》作为《左传》的附庸而存在,不少学者似乎习惯将它看作《左传》研究的副本,谈《左传》可以不谈《国语》,谈《国语》却必定要论及《左传》,《国语》的独立性无形中被消解了。但是,《国语》到底是单本流传,它应该且必须有自己的地位,而这决不仅仅是因其与《左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语》隐含着的中国早期散文发展的轨迹,便是它不可忽视的价值。

《国语》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记载了西周、东周王室和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的史事,上至周穆公,下至鲁悼公(约公元前1000—前440年),侧重于记言,偶亦记事。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西周一些比较重要的诸侯国诸如燕、卫、蔡、陈、宋等国的史事均未采入。各国史事在书中所占的比例也有较大悬殊,《晋语》所占篇幅最多,共九卷,而《郑语》、《齐语》仅有一卷。全书前后的语言风格不尽一致,开头的《周语》、《鲁语》比较古朴简练,而居于篇末的《吴语》、《越语》则欣赏智慧权谋,这与《韩非子·五蠹》所说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正好相互印证。这些因素都表明《国语》并不是一部有着缜密构思的史著。严格地说,《国语》是“编”而不是“作”,编者只是从手头上掌握的各国史料中选取一些有益于王侯治国的言论汇编成书。虽然该书在语言上

没有做很好的统稿工作,但客观上为我们研究我国早期散文发展的轨迹提供了最切实可靠的原始资料。

《国语》散文第一阶段的特色以《周语》为代表。首先,这一时期的文章大多为语录体而非对话体,几乎都是由某一具体事件引发贤人的一番金玉良言。事件的起因一般用极简略的语言加以交代:

穆王将征犬戎。

厉王虐,国人谤王。

厉王说荣夷王。

虢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

针对这种种问题,圣人进行一番旨在说教的言语之后,对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也只是一笔带过: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康王不献。一年,王灭密。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

**作者简介:**孙雪霞(1975—),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

氏之戎。

叙事的淡化,使贤者的嘉言得以鲜明地凸现。应该说并不是记述者有意的布局,而是受当时叙述水平的限制,叙事者缺少一种宏观把握的能力,所以只能对所听之事做忠实的笔录,对其中因果关系的叙述便大而化之,如此一来,在客观上却收到语言凝练、情节不枝不蔓的效果。

其次,对言语的刻画一般是就事论事,很少铺陈比附。在后代散文中屡屡出现的比喻、寓言在《周语》中决然不见痕迹。《周语》三卷,我们看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寓言故事,而行文间的严谨、庄重、凝练,倒是与《尚书》有着某些神似之处:

务力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

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敬,奉以忠信,弈世载德,不忝前人。

这分明是祭坛上思先王嘱后主的言语,讲究的不是情采的迸发,而是任重道远的历史感和语重心长的责任感。斟酌词句,庄严肃穆,大有“空谷回音”的神圣感。

再次,《尚书》、《诗经》的某些章节直接作为论据加入记叙。这与其他典籍对《尚书》、《诗经》的运用明显不同。譬如在《左传》中,《诗经》往往是作为外交场合中必备的背景知识,那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但在叙述中,因为作者已经对描写的人物有了明确的评价,《诗经》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只不过引用之后,提高了整个作品的文学价值。又如在《荀子》中,《尚书》、《诗经》的引用一般是作为问题的结论而存在,事实上,对于一个问题,作者已在字里行间下了定论,但他还是在最后加入这么一段引言,使得文章严谨而厚重,例如:

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修身》))

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荣辱》))

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非十二子》))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篇末结语,我们可以看出,就算没有这句话,整个叙述还是完整的,所传递的思想也是清晰的,加入这么一句作结不过是提高了文章的文学性和观赏性罢了。而在《周语》

中,引言却是支持论点的有力论据之一,完全不可或缺。周是离夏商最近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合理的设想:因为年代相隔不远,《尚书》在人们眼中还没上升到“圣书经典”的无上高尚的位置,也还没有必要利用它来增添文章的文采,所以只在论述中需要的地方作为较具权威的论据加以引用。只举一例为证:

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这里周文公《颂》的引用是作为“先王耀德不观兵”的证据而存在,没有这句话,祭公的谏言便成了无根据的空话。

第四,就思想内容而言,正如上文引用韩非子的话,这是一个“竞于道德”的年代,谋臣策士还未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焦点,对三皇五帝的向往依然是王室诸侯日常生活的主要目标,所以在这一时期散文的主题中,闪现的不是智慧的光芒,而是完美道德的醇香。这里与《尚书》有着某些相通之处,或者说,他们共同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下表也许能展现这一特点:

《尚书》	《周语》
肆王惟德用,和怵先后迷民。《梓材》	懋正其德而厚其性。
彼裕我民,无远用戾,《洛诰》	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冲子嗣,则无遗寿,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诏诰》	肃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

第五,在上古时代,“天”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周语》中也有具体体现。它与后来“天”成为制约人们行动诸多因素——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一个因素不同,它在上古的位置是唯一的,绝对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对天的虔诚和敬畏印刻在《尚书》的“诰、誓、训”中,也同样洋溢于《周语》记述者的字里行间: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

布施优裕也。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

“天”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担当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能预兆祸福,取悦于它便有“优裕”可得,与它争物,则“害多矣”。它是神秘、公正而又专制的化身。

## 二

散文行进的轨迹,在上世的《周语》和中古的《越语》之间,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过渡阶段,这里以《齐语》为代表。《齐语》的篇幅主要集中于论述管仲怎样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的过程,在这条主线下,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与《周语》不同的行文特点:

其一,原先语录体的形式逐渐为对话体所取代。虽然此时的对话体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只是对论述的层层推进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但至少它使论述由点及面地展开,思维缜密、说理周全、气势宏伟的特点便渐进而成。在这种对话中,主次还是很分明的,“王”仅仅是一个引出话题的陪衬,很难见其个性特征,文章的重点在于表现谋臣的胸怀与智慧。如简短交代桓公使鲍叔为宰之后,便是鲍叔的一番宏论;如庄公将杀管仲,又引出了齐使者的一番高见;在桓公“成民之事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的追问下,管仲勾勒出了治国之蓝图。

其二,历史车轮行进至此,盛极一时的周王朝已经衰微,谋臣们战略思想也从“巩固天下”转移到“称霸中原”。曾经为周王朝的繁荣起到极大作用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到此时走完了一种制度所能走过的历程,旧的制度需要打破,新的制度亟需建立,在《齐语》篇中,我们恰恰就看见了这种社会需求的反映。管子从“安民、制国、求学、商贾、军旅”等各方面为齐桓公规划了一个极为严谨而有条不紊的社会新秩序,新的社会制度已在管子的“帷幄”中悄悄形成。

其三,士阶层主体意识开始觉醒。《齐语》中的士已逐渐形成一个阶层,在国事中举足轻重。他们人格相对独立,个体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序的舒展。士与王亦师亦友,不再像《周语》中的谋臣,仅仅是政治的附庸,在“王”这个权力终极者面前,纵然冒死进谏却难被采纳。管仲在齐桓公面前长

袖善舞、游刃有余,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成了齐桓公霸业构建中最为得力的助手、或者说幕后总策划,真是羨煞昭公、芮良夫们,一种后来驰骋中国几百年的“士文化”此时已崭露头角。

## 三

散文的行进历程跨出了《尚书》等古籍的强势影响之后,一路向前迅速地发展。在《国语》后半部分,特别是《吴语》、《越语》,文风一改在《周语》、《鲁语》中的凝练简洁、古朴平和而变得波澜起伏,酣畅淋漓。这里只以《越语》为例:

首先,文章已全然为对话的形式。就对话双方来说,作者平分笔墨,不再使某一方仅仅成为陪衬。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某一方的性格特征,而是两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像《越语》中的叙述双方——范蠡和越王勾践,这两个人物的形象都是凸现的,范蠡的从容、潇洒、荣辱不惊,越王勾践的任性、隐忍、急躁都在他们的对话中一一呈现出来。

其次,叙述故事性的增强。这一时期的《国语》,已很少出现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不但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有大小故事穿插其中,更表现出叙事的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吴语》、《越语》就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吴越争霸图,就算在以记言为主的记述中,我们仍能清晰的理出关于那段历史的分明的脉络。相对于《周语》对历史事件粗略的介绍,这里足以显示叙述者笔力的深厚及对宏观结构的全面把握。

再次,思想价值观的转型。被上古的人们称颂了千百年的仁义道德在这里已丧失其一统文章思想全局的地位,而谋臣策士的智慧却成了文章所关注的重点和欣赏的焦点。在范蠡的进谏中,很少出现大而化之的道德说教,更多的是针对具体事件提出的具体的谋略,至于这谋略合不合道义,却已不在他所关心的范围之内。譬如,他建议越王勾践:

王其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肆与大夫觴饮,无忘国常。彼其上将薄其德,民将尽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

在崇尚道德的社会,这样的计谋是不会由辅佐君王的忠臣这么大而皇之的提出来的!又如他

劝诫越王：

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看到这里觉得还与传统的仁义道德挺相契合，再往后读才知道并非如此：

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使；此逆于天而不合于人。

原来范蠡阻止勾践，在别的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时去乘虚而入的主要原因是：现在自己的国家还未强盛。正是在欣赏范蠡玩弄种种权术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价值观所发生的重大转变。

第四，在神人关系中，已是神人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从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一步步反败为胜的进程中，我们可看出“天”已不是决定一切的主宰，而人事的作用也逐渐被谋臣们所重视。

此逆于天而不合于人。

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

我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时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

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

由此可见，“天意”和“人事”成为并重的两个制约事情得失成败的因素。“天”不再是不可企及，“人”也不再是道德家口中的空论或君侯们手中不足轻重的棋子。一个的神秘感在下降，另一个的重要性在提升，于是在某一个高度寻到了相通的接触点，便共同统领着、成就着君王称雄称霸的大业。

第五，文风从《周语》、《鲁语》的庄重严谨、古

朴平实转向了轻盈流畅、层次井然、气势逼人，大有战国策士铺张扬厉、气势纵横之风。

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

君王已委制于执事之人矣！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

范蠡的这些言辞，已经把战国时期特有的外交辞令运用得相当娴熟，义正词严又有理有节，不愧为一个“用兵甚少，而名声彰明”的杰出政治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国语》就是在读中国早期散文的发展史。海德格尔说过：“一首诗的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和诗人的名字。”《国语》的作者很聪明地让自己遮蔽于作品背后，作为一名史官，他听到了使命的召唤，于是他把那个时代的史实聚集于自身并把它放置到被召唤的位置，而自己便实现了不在场的在场。这种实录显示着某种宁静，宁静的本质在于它静默，而作为寂静的静默总是比一切运动更动荡，比任何活动更活跃。我们从散文发展史的角度切入可以得到启示，而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也定有所斩获。一言以蔽之，《国语》的伟大，就在于它这种在历史使命下所绽放出的实录精神。

[责任编辑：章 金]

#### 注：

①《国语》引文皆出自：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②《尚书》引文皆出自《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荀子》引文皆出自：《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上海书店1994年。

(上接第61页)要“言说”些“什么”，总要有“所说”(said)。我们不可能对少数弱者说：“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要牺牲你们的利益。”这是蛮不讲理的多余言说，毫无与对方平等对话的愿望。对于“大道不言”的隐士，由于他们不屑与我们理性对话、不屑参与交往共同体，我们对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但对于那些喋喋不休、向我们论证自然主义理论的思想家，我们就要坚定地对他们指出：“你们的行为是自相矛盾、首尾不一的，因为你们

希望辩明我们的好辩行为无理。”如果鲲鹏和学鸠各有各的自然本性，扭曲自然本性是最糟糕的事，而万一人的本性就是言说和辩论，那么，“大辩不言”就是扭曲本性、极不“自然”的事了。

[责任编辑：黄旭东]

#### 参考文献：

[1] 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关文运译，1991。

[2] 马丁·布伯：《我与你》[M]，北京，三联书店，陈维纲译，1986年。